

守正创新 交流互鉴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李六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了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领航定向，为文化及文物保护领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工作的部署要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和平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基调，创新性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三者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在纵向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和横向民族认同意识、空间维度上的统一性。同时，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连续和统一，反哺了中华民族和平、包容、创新的文明特质。可以说，五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共同绘制了中华文明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和为贵”“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思想已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包容理念与和平思想密不可分，常常并列出现，如“和合共生”“和而不同”“尚和合、求大同”等。从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到“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后的鎏金银银链，从库木吐喇石窟到泉州清净寺，珍贵的文物

实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兼收并蓄。从《步辇图》到《元世祖出猎图》等则展现了中华文明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维护。在历史中，中国虽几经分合，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其中，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奠定了重要基础。秦朝以来，中国实现了从“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到“书同文”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涵养了各民族对文化的认同感，也铸就了国家统一的信念。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源泉。《周易》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创新的理解。一味因循守旧，只会导致停滞不前，只有以变应变，另辟蹊径，才能历久弥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20余种文明，中华文明始终未曾中断。连续性将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步辇图》

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继承与发扬，这就决定了其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守正创新，从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只此青绿”“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等以文物为灵感源泉的文化产品广受人民群众好评，这既证明了现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滋养，也表明老文明焕发新的活力需要依托创新实践，而文明创新的主体就是人民。毛泽东同志讲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必将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和传承。现代文明相对于未来而言也将成为“古代”文明，我们今天为未来留存什么样的“古代”文明？除了保护传承好今天依然存在的万里长城等古代文明，还要保护传承好科技文明和工业文明产物，让未来的人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成就和进步。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以和平、包容的姿态与世界文明开展平等的交流对话。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致“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开幕式的贺信指出，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系列论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指引，也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特色。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既是文物的守护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者。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文物和文化遗产工作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多重价值挖掘工作，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如配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程，做好长城、长江、大运河、长征文物保护及价值挖掘研究，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与展示传播工作等。坚持守正创新，科技引领，积极推动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立项，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围绕文物病害监测与分析、文物保护材料研发、文物科技鉴定、装备工具发明、技术工艺创新与标准化、文物保护监测等问题和挑战，尽快补齐短板弱项，力争提出文物保护利用原创理论，助力提高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以实际行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史学新篇章

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全国史学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强调指出要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最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宏阔历史视野，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人党对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方向指引，对于推进文化理论创新、深化历史文化研究、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高翔指出，全国史学界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学习、领会、研究、阐释讲话的重大观点、重大判断、重大结论，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新局面，尤其要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人民做学问、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等方面着力。铭记领袖嘱托，铭刻时代辉煌，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史学新篇章，为强国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史学智慧和力量。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历史研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时代历史学研究工作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史学贡献。

以弦乐华章坚守文化之根

本报记者 谢颖

《牧歌主题变奏曲》《顾嘉辉燃烧金曲回响》《四季》……6月14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动听的音符不断从琴弦上流淌出来，让观众如痴如醉。这是香港弦乐团“一代香港情，弦系祖国心”主题巡演音乐会的最后一场，从6月2日到6月14日，从深圳到哈尔滨、长沙、天津、沈阳、北京，曲传妙韵，演绎出民族与流行的碰撞，港风与古典的联结，更表达着用心讲好中国故事的不懈努力。

“弦代表着音乐，祖国心则代表着民族情感。”“弦系祖国心”表达了音乐与民族情感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的根是承前启后的发展动力，寻找和坚守中华文化的根，始终是融合国家发展大局的基础。”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弦乐艺术总监姚珏告诉记者，为体现香港中西合璧的文化艺术特色，向世界展示香港的

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的深邃意境，香港弦乐团致力于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与西方音乐、西方乐器融合创新。这次音乐会将西方古典、港乐经典，还有凸显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进行独具匠心的编排与演绎，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的同时，展现出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使乐迷能够感受到风格多样的跨文化艺术魅力。

香港弦乐团有着众多优秀的青年艺术家，姚珏的希望是，通过演出的开展，为香港与内地青年搭建交流和互相了解的机会与平台，努力让内地的观众见证香港青年音乐家的蓬勃朝气与舞台风采，让香港青年加深对祖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切身了解祖国的发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国音乐大典》探索“中国乐派”历史传承

本报记者 杨雪

近日，中国音乐学院推出了系统总结中国音乐数千年文化积淀与积累的著作《中国音乐大典》，积极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创新。

《中国音乐大典》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王黎光主编。他表示，《中国音乐大典》旨在通过一部大型资料集成的编纂，探索“中国乐派”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艺术实践与理论依据。通过全面梳理中国音乐历史脉络，为中国音乐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丰厚的音乐文化资源和理论支撑，也为传承中国音乐文化，塑造中国音乐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托。

《中国音乐大典》按照知识分布形态，分为“文论编”“图像编”“乐谱编”和“音像编”四编，其编纂工

作是在中国音乐文献层面上进行的一次全面深入的音乐文化普查，梳理中国音乐历史文化脉络，制定严谨、科学、经典、规范的编纂原则与体例，以典、编、卷、册为序，将方方面面的内容分门别类，按卷入册，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音乐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与整体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认为，中国音乐学院是一所以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己任的高等学府，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了学校倡导和建设“中国乐派”的历史重任，亟须对中国音乐资源进行科学化、体系化的整理，更好地阐释中国音乐文化的内涵价值。《中国音乐大典》正是中国音乐学院近年来为弘扬中国音乐文化、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而做的重要尝试之一。

展现海纳百川的“大科幻”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日前，2023中国科幻大会发布会召开。面对当今时代科技发展迅猛、ChatGPT能力突显等境况，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认为，人类已经进入跃迁时代、科幻时代，造成了特殊的人类生存困境，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而科幻文学，由于其与科学的天然联系，很适合展现和诠释这种生存困境。从这个角度看，科幻文学是“后人类”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这个时代的乡土文学。

科幻是文学，文学是人性，是描写人性的，但是，人性、人类道德伦理乃至人类物种，都是动态的。对此，王晋康表示，我们通常说的“人性”是狭义的，科幻作家应努力向外看，写出更恢宏宽泛的

人性。他以个人创作为例进行阐释：如国棋棋王K君，在人类选手中傲视群雄但不得不对人工智能俯首称臣，因而沮丧郁怒；如AI妈妈，把人类照顾得无微不至……王晋康认为，这些人物形象已经或将出现在现实世界里，所以目光敏锐的作家不应该忽略他们，要把这些新的文学形象纳入作品中。

在王晋康看来，主流文学作家对人性的描写是平视、自视、内视，是哲人的悲悯目光，更关注个体和今天，鲜活细腻；而科幻作家是俯瞰、外视、他视，更关注族群的整体和时间的整体，恢宏深刻。从这些特质说，科幻文学已是“大科幻”的概念。



《只此青绿》

唐宋园林：回望历史的一扇花窗

刘阳朔

园林是写在大地上的诗文，是作在大地上的绘画。唐宋时期众多精美的园林与文人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承载着他们的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书写着建园、居园者的个性体验。李小奇副教授的学术专著《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是园林文学研究方面的新作和力作。诚如著者引言中表述的那样，筑圃见文心、记园见文心、研究见文心，阅读后感颇多。

唐宋时期的园林散文中管窥当时极高的园林审美艺术，认为中国古典园林是将自然元素浸润了人的主观审美后创造的艺术品。园林的艺术品质取决于造园者的审美理念、审美情趣、审美品位，因此，造园者的园林美学思想在整个造园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决定了如何叠山置石，如何布局建筑，如何栽植花木。治园如作诗画，妙在思致，雅在情趣，品在意境，是三维立体空间中的造型艺术。艺术构思尤为重要。唐宋时期的诗歌、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造园家多为艺术修养极高的人，他们将诗境、画境、书境引入到造园实践，将建筑、雕塑纳入园林景观，提升了整个园林艺术的审美境界，造就了唐宋时期的园林艺术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宋园林是后世回望当时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窗口。

唐宋园林是诗意生活的镜像

园林不仅是欣赏四季美景的场所，也是生活的空间，唐宋园林是时人诗意生活的镜像，是诗意栖居的理想之所。在园林中可以观赏优美的风景，如王维与好友裴迪在辋川园林中步仄径、临清流，泛舟歌湖，满眼四时风物；司马光在独乐园池边垂钓、竹林纳凉，闲淡疏放。园林还是生活空间，充满了人情的味道和生命的温度。张守节在《四老堂记》记述自己回到家乡会稽筑园养老，与兄弟故里相聚相亲，尽享天伦之乐；吴敏在《竹洲记》中描述自己在园林中奉亲养老之乐；吕午、洪迈、袁燮等则记录了在园林书斋课授子孙的融融亲情。

园林中有亭台轩榭、厅堂楼阁等不同建筑，室内设施齐备，故非常适合高

朋宴集。园林集会有以皇帝为中心的君臣宴集，地点多在皇家御苑或者王公贵族的私家宅园；也有以文人为中心的文士宴集，地点多在私家园林或官署园林。园林雅集的内容主要有读书、赋诗、饮酒、下棋、抚琴听乐、谈禅论道等。白居易在《池上篇并序》记载了自己的园居生活：园中有竹千竿，布置有太湖石，养着华亭鹤，园中有池一泓，中生白莲，桥通三岛。白居易常于园内亭堂中饮酒，在池沼的西边专门建造一座琴亭，可以与宾朋在亭内临水抚琴，“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日，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园中的弦歌之声犹在耳畔，其悠游燕息之态如在眼前。

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论道、鉴古、考订经籍也是园林雅集的重要活动。如书中所列举的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就有鉴赏古画、古器的描述。黄裳《默室后圃记》写其友人：“乃之圃之中，讽遗编，鸣寒弦，衔素杯，战枯局，联诗篇，点花数，与忘形交，于此为谈笑，以寓道情之至乐。”这种诗意生活引发今人的无限向往之情，也引发我们对天地间如何安顿身心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

唐宋园林是文学创作的触媒

从该书的研究可见，唐宋园林的发展为散文书写提供了新的题材，催生了园林散文的创作。园林卜筑是土木兴造的大事，应当通过作记以备不忘，传至

后世，于是就有了三种园记生成机制：一是园林落成后园主自己作记以志；二是游园而记，即某人游览了朋友、僚属的园林而记；三是园林营建完成后请人作记，即“求文记之”。唐宋时期大量的园记散文由此产生，可见园林兴建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关系。

陈从周先生说“文因景成，景因文传”，园林建造成功之后，观赏园林景观、园林雅集等园居生活的体验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花草树木是构建园林的重要元素，园林草木更是作者钟爱的书写对象。园林中的虚静优美之境利于格物致理，培养文思，激发创作的灵感，因而园林诗文数量可观，如白居易作“池上篇”诗文，李德裕作“平泉山”诗文，邵雍作“安乐窝”组诗等。而书中关于花木栽植之情的论述富有特色，充分体现了研究者的文心和情怀，更能够打动读者。书中所举李德裕寻求花木不遗余力，洪彦懿抱瓮灌园、周必大殷勤养护、周紫芝对园中花木的日日看护与期待、元表保护老梅等，体现了诸多园主对待园林草木的深情，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动。

园林空间的景观布局也是文人书写的重要方面，建筑之景与自然之景的融合，园内外之景的相得益彰，园林意境与园室陈设的彼此融合，从而阐释园林的整体立意。

唐宋园林是今人回望历史的一扇花窗，一方圆月，透过它可以更多了解唐宋时期园林艺术的造诣，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文人的生活样态。读者可以在深入阅读中体会更多的精彩，去进一步领略书中所呈现的重重心。

（作者系渭南师范大学教师、西北大学博士）

